

# 客地风物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江金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江金波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6

(客家研究文丛)

ISBN 7-5623-2027-6

I. 客… II. 江… III. 客家-民族文化-研究-广东省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1290 号

总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发行部电话：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202@scut.edu.cn](mailto:scut202@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

责任编辑：周莉华 黄丹丹

印刷者：广东省阳江市教育印务公司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5 插页：2 字数：262 千

版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序言一

文化地理学在我国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但是文化与地理的联系，却出现较早。1902 年，我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地理与文化关系》中，说明世界文化的差异与地理的关系。西方的文化景观概念出现后，以文化来说明人文景观。193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地理学》中，将文化地理列为人生地理（即人文地理）中的一个分支。我国人文地理学家张其昀、林超、李旭旦等在人文地理的研究中，都曾对文化地理现象给予重视。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者索尔，从上世纪 20 年代开始，与考古学家结合，将文化景观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从而发展了文化景观学派，大大促进了美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

在我国，当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介绍多是法国的思想。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断了对西方地理学思想的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变成一家独鸣。西方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被与政治联系，贴上标签，成为资产阶级的，甚至成为“反动的”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成为禁区，学校里没有人教，学生也无此课可学，原来教人文地理课的亦都改行。地理学中，只剩下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家。其实，经济地理也只是讲苏联学派的经济地理学。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学术禁区逐渐消除，地理学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文化地理学思想理论从 80 年代中介绍到我国，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注意，有了一些发展。但是，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并不很快。我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文化地理学需要广泛的学科基础，在地理学中，不但要有好的人文地理基础，还要有好的自然地理基础。在其他学科中，要有很好的历史学基础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基础。在我国，学生方面，地理系学生多愿学些技术与应用性学科，不仅就业机会多，深入下去也较方便；学文化地理面太宽，不易掌握，也难以深入。还有在教师方面，多是

学历史地理或其他方面转入此领域的，从国外以文化地理专长学成归国还很少见，这就使文化地理教师特少。这些当然影响文化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

我认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在中国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特别是惟一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她代表东方的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与历史到目前还只是为历史学所用，文化地理学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时间观念、历史过程，对文化地理学十分重要。可以说，文化地理学是时空相结合的科学。只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整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地理有了基本研究与成果，才会为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山大学的司徒尚纪教授有良好的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基础，在广东这个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对南方文化地理进行深入研究，写出大量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形成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江金波师从司徒教授，写成《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很有特色和价值，现付梓在即，值得祝贺！

客家人原居住北方，因战乱迁徙南方。在他们迁到南方时，南方环境好、适合发展农业的低平地区早已为先来的移民所占据，他们只好向环境条件较差的山地求发展。因早来的移民已在当地占据主体地位，他们称这些后来的而且居于山地的移民为“客”。遂有“客家人”或“客家”之称。

虽然南方大多数人都是北方移民，但来的时间有先后，加上这些后来的人，因北方战乱，多举族迁移到南方，住在早先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客家人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够生存。在相对孤立的环境中，他们保留了不少早先的文化传统，同时又形成一些新的文化。所以，客家文化在我国地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家文化最集中的地区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及其周边地区。

江金波的《客地风物——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研究》一书是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客家文化的尝试。书中对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理论新框架。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人、文化与物质环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该研究的理论部分。

在历史发展方面，本书将粤东北客家文化发展分四个时期，即宋元时期、明清至1949年以前时期、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时期。作者把第一时期当做当地客家文化生态的孕育时期，第二时期为从成熟到失调时期，第三时期为文化生态的动荡时期，第四时期是其文化生态的优化时期。

在当前的该地客家文化生态系统方面，作者的研究着重在三个方面：首先分析客家人在梯田农业生产中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尽管梯田是南方山地、丘陵地区水稻

的普遍方式，但是粤东北客家人的梯田水稻种植中却存在与其宗法社会、葬俗、方言等方面的联系。其次，剖析了客家人围龙屋建筑的文化生态。客家人的建筑与其格局在其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客家地域文化景观的标志，而且这种建筑文化形式反过来对客家文化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第三是沼气的利用带来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与所有文化一样，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这里，沼气的引入使当地的原来文化生态环境有了新的变化。最后，作者以上述三方面为依据分析与探讨了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与文化生态空间格局的优化。从以上情况看，作者不仅从学术角度探讨其成因，并注意发生变化的文化生态系统的优化问题，使理论的研究与实际效益相结合。

总之，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特别需要这种深入细致的区域性调查研究。只有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才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地理学建立在自己的大地上，才能成为一种有自己文化特点的文化地理研究。江金波博士已进入这一领域，希望中国地理学界能有更多的同行参与进来，以加速这一学科的发展。

王恩涌  
2003年7月15日  
于北大中关村

## 序言二

自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后，环境生态问题被重视有加，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各种区域规划、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生态优先”观念为人们普遍接受。从地理学视角观察，这说明在人地关系认识上有了实质性进步，即从过去提倡“人定胜天”，战胜、征服、掠夺自然逐步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力图达到中国人追求的“天人合一”目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热”研究中，“文化生态”作为文化地理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凸现出来，相继出现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丰富学科理论和建设，以及为地方社会发展服务，都贡献匪浅。

粤东北客家地区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长期影响下，原始自然景观无论其结构与功能均已发生很大改变，并朝着不利于自然和人类的方向转化。与这一过程同步发生的主要是客家人的活动：一方面是这种变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力图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创造出形形色色的文化生态模式，开发那里富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繁衍子孙。一部客家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客家地区环境生态变迁史，人地关系认识从肤浅向深入，文化生态模式选择从盲目向自觉、从原始到理性的发展历史。这可在研究客家区域文化、客家文化人类、客家经济和客家社会等论著中得到某种验证。

问题在于，已有的涉及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的研究，大部分是零碎的、片断的，未能摆脱就文化论文化局面，亦即缺乏对客家文化生成和特质与环境关系的深入剖析。也就是说，用建立在环境资源特点基础上确定人类行为和方式的传统文化行为观来诠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改造和利用，其立足点是过去和现在两种时态，这是不够的。现代文化生态研究不仅有这两种时态，而且更着眼于未来，以期消除自

然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构建理想的文化模式。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江金波博士这部著作，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成功范例。

首先，该著述从粤东北客家地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基础出发，用一种历史演进方法，导出这一地区文化生态的变迁规律，指出掠夺式土地利用方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而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也加速客家民系向土地过度索取。二者同恶相济，加剧人地矛盾，不但使生态环境向不利方向转化，而且加剧客家人外迁及其文化传播。这一规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同样是一系列历史地理剖面。这显示作者对影响这一地区文化生态变迁的因子能深刻地把握和理解，尤其是在揭示该地区人地矛盾作用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历史阶段性以外，更注重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层次性和双向即互为因果性，特别是两者之间的适应、协调、侵蚀、冲突模式的建立和剖析，已达到该地区文化与环境两大系统的深处，并在理论上作了提升和创新，从而对这一领域和这一地区文化生态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该书选择对粤东北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几个文化生态因子，包括梯田、围龙屋、废弃有机物等，从他们的结构到功能、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层面剖析其文化生态意义、利弊得失，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等，从单个文化要素即横的方面，反映它们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有助于对该地区文化生态变迁总体规律的认识，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决策上的重要参考，而其采用的这种纵横或经纬结合方法在该项研究中得到良好结合，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客家民性是客家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已有成果主要反映客家民性自身一系列特点，而少有涉及它与生态环境感应关系。该著从地域文化生态综合物质视角，指出客家民性崇文尚学、讲究礼仪；勤俭节约、自强自立；质朴率直、重视声誉等优良传统，以及在部分群体中存在的心胸狭窄、自负自卑、保守怀旧、重本轻末、不善变通等弱点，皆与客家封闭地理环境、短缺自然资源、占统治地位强大宗族社会下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等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态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补已有研究之不足，拓展客家文化研究领域，不但对客家的区域文化地理，而且对客家的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研究等都有重要参考意义。

最后，客家地区文化生态区域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揭示其区域分异规律，也是前人很少涉足的问题。该著以自然地理基础、文化群落特征和环境生态效应为依据，划分梅县、兴宁、五华、蕉平、丰埔等文化生态区，指出它们文化生态特点和差异根源并构筑起该地区文化生态空间总体及其差异概貌，对规划和实施该地区文化生态建设工程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在理论建构尚不完善背景下，江金波博士

## 序言二

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这部专著将有助于学科建设，也是值得称道的。而本人作为论文写作导师，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也不一定正确，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03年9月25日

于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 目 录

---

第一章 研究述评 .....	1
第一节 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 .....	1
第二节 区域相关研究述评 .....	13
第二章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38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38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资料来源 .....	42
第三节 选题意义 .....	44
第三章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形成的地理基础 .....	46
第一节 自然地理基础 .....	46
第二节 社会人文地理基础 .....	50
第四章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 .....	58
第一节 宋元客家文化生态孕育 .....	58
第二节 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客家文化生态从成熟到失调 .....	61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客家文化生态动荡 .....	66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客家文化生态优化 .....	69

第五节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演变规律及其模式选择 .....	73
第五章 粤东北客家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研究 .....	82
第一节 梯田形成的文化背景 .....	82
第二节 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84
第三节 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能量、物质与文化流 .....	89
第四节 梯田文化与客家宗法社会 .....	92
第五节 梯田文化与客家精神 .....	94
第六节 梯田文化与客家方言 .....	98
第七节 水土流失景观的形成及其对区域（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危害 .....	101
第八节 客家梯田文化生态的现代转型 .....	104
第六章 围龙屋建筑文化生态剖析 .....	109
第一节 粤东北传统客家民居的基本形式 .....	109
第二节 围龙屋建筑文化形成的生态剖析 .....	113
第三节 围龙屋的取材、内部结构及其文化生态功能 .....	125
第四节 慎终追远、崇文重教的神圣空间 .....	132
第五节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视野下的围龙屋 .....	138
第七章 废弃有机物开发利用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	146
第一节 沼气开发的自然条件与生态原理 .....	147
第二节 沼气利用在粤东北客家生态农村建设中的效应 .....	148
第三节 粤东北沼气利用的基本类型与生态模式 .....	154
第四节 粤东北山区沼气利用走向与前景的文化生态学思考 .....	159
第八章 粤东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态成因探秘 .....	169
第一节 粤东北客家民性基本特征 .....	170
第二节 粤东北客家民性的自然生态成因 .....	172
第三节 影响粤东北客家民性的社会生态环境 .....	175
第九章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的空间格局及优化措施 .....	180
第一节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的整体特征 .....	181

第二节 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的地域分异 .....	182
第三节 优化粤东北客家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对策与措施 .....	191
附录 1 论文化整合与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 .....	198
附录 2 梅州客家民俗旅游资源及其开发 .....	209
后记 .....	217



# 第一章

## 研究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

自从半个世纪前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以来，通过中外学者的不懈探索，文化生态学研究在多学科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化生态学理论问世。涉足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有关学科，由于受各自的学术视野局限，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其操作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体系与理论要义有较大差别，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突出表现为系统性差、兼容性弱。其理论分布与水平的这种状态固然是学科成熟必经之途，然而，在世界性的许多问题明显源于人类自身，生态观与生态方法日益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从而使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迅速增强的今天，文化生态学加快其学科理论建树，提升其在相关学科的应用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在文化生态研究中有自身优势，是人所共知的。为此，文化地理学一直将文化生态学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遗憾的是，迄今文化地理学仍未对文化生态学做出特别的理论贡献。发挥地理学区域研究与系统综合研究特长，整合既有文化生态学理论，形成新的统一的学科理论体系以促使其独立发展，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述评

### 1. 源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人地关系一直是地理学传统的研究主旨所在。现代人地关系研究表明,文化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文化调控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成为构成地域特征的重要因素。为此,文化被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契合点。文化被理解为人类在环境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复合体<sup>[1]</sup>。索尔有关文化景观的卓越研究使文化地理学研究文化的特长显见,文化景观学派曾风靡一时。直至今日,在美国文化地理学几乎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代名词。在吸收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化地理学从时空双向维度,藉以地域系统观的指导不断增进着对文化生态学的认识。生态观点被理解为人类及其行为与环境,加之时间、空间和生产关系的三角态势的评判<sup>[2]</sup>。Kent Mathewson 觉察了文化、景观与生态研究终将走向统一的趋势<sup>[3]</sup>,认识到人类圈只是全球系统五元系统之一<sup>[4]</sup>,建立了“环境感应与行为学说”、“人类营力”及“人地关系供求学说”<sup>[5]</sup>。现在文化生态学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生态侧重研究有文化的人群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重点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发展的影响和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迄今为止,地理学界已出现的文化生态理论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适应论、感应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它们对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sup>[6]</sup>。有学者深刻认识到,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讲,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社会保留了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未达到极限,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sup>[7]</sup>。生态环境在民族文化演进中的历史地位是可变的。生态环境在个别环节,特别是在民族文化源头上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sup>[8][9]</sup>。这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我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批评的理性反思<sup>[10]</sup>。

近二十年来,文化生态的宏观地理研究在我国的推进重点表现为: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论成为流行趋势。这迎合了20世纪后半叶人本主义在我国兴起的潮流,并由此直接引发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使之成为人地关系研究新热点<sup>[11]</sup>。近年来,行为理论也被运用于文化生态乃至文化地理其他领域<sup>[12]</sup>。伍家平据对侗文化剖析提出“民族文化地理系统”概念<sup>[13]</sup>。无疑,人对环境的适应研究是地理学者从事文化生态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sup>[14][13][16]</sup>。从这一角度认识人地关系的互动特征,探讨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动态关系,是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课题。IGBP组织的2000年人与环境适应研究就是明证。韩茂莉与

此相关的研究发现,由于人类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与能动反映,人类调整生产与生活的每一次文化行动,都可以作为人地互动信息的反映<sup>[17]</sup>。对环境历史地理学的众多研究表明,人地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有自然环境自身剧变的原因。近现代则更多表现为文化生态不适的原因<sup>[18][19]</sup>。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生态研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既往的研究事实说明,文化地理学未能提炼出有自身特色、深层系统的文化生态理论。这里不是将人地关系论的加积视为文化生态理论,就是对相邻学科理论的简单借用,权作一时之宜。问题在于,人地关系论不但未成统一的理论,从层次上和侧重点上都满足不了作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的需要。文化生态学在文化地理学中的生存与发展呼唤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重构。

## 2. 源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文化生态学主要由美国文化进化论学者斯图尔德创立。斯图尔德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专著中完整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进化理论,即文化—生态适应理论。他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它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sup>[20]</sup>。在斯图尔德构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大厦中,文化核心、文化类型、社会文化整合水平等是重要概念。斯图尔德认为在一个文化系统内,总有一组文化特征构成其核心。当该文化适应环境并形成其特性时,以经济为中心的互相联系的一组文化特性就表现出很大的作用,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文化类型由核心特征组成,同一类型文化的生态适应和整合水平是一致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可以理解为社会文化本身的不同层次、水平、等级以及文化和社会互相作用产生的水平。换言之,环境适应产生核心特征,核心特征造就文化类型且体现社会文化整合水平。斯图尔德主张通过分析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分析用特定技术开发特定地区的行为方式以及确定环境开发中行为方式影响文化其他方面的程度等途径检验文化核心的环境适应。总之,斯图尔德用文化生态学解析文化差异和相似,试图概括文化规律、文化变迁的原因。其理论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因果关系理论,最终认为在生态条件和技术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社会政治结构就类似。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怀特(L. A. White)认为它是历史特殊论模式<sup>[21]</sup>。墨菲(R. F. Murphy)将其视为社会学的唯物主义<sup>[22]</sup>。莱塞(Alexander Lesser)概括斯图尔德的社会进化为单线发展论<sup>[22]</sup>。哈里斯(M. Harris)赞赏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解决文化比较的具体问题<sup>[23]</sup>。吴文

藻在肯定斯图尔德将自然科学引入文化研究的意义的同时，指出社会科学有其自身规律，只能用自然科学规律解释而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规律替代<sup>[24]</sup>。黄淑娉等认为人类学研究应该注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但只讲技术，不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不全面的<sup>[25]</sup>。笔者认为，斯图尔德建立的文化生态学说奠定了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基础。他首次将生态学原理引入文化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与环境因果关系并系统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类型与意义，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其文化适应自然的方式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应的观点值得肯定；他以整体观点研究人口、居住条件、家庭结构、土地利用及其他资源与技术发展等相关关系，比就文化论文化或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增长的观点有很大进步。他所确定的以特定环境下特定行为模式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内容观点，尤其是确定区域“文化内核”是与生存和经济行为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文化，并认为必须对其进行详细研究的指导思想，都极具前瞻性。这一切均比其前的社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偏重人类生物学研究，以及从中未能离析人类文化现象的方法是巨大进步。只是其将社会文化变迁看做是环境单因素的线性结果是极为片面的。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学者很早也注意到文化生态方面的研究。自20世纪初叶起，李大钊、冯友兰、梁漱溟等在探讨文化生成机制时，就力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差异性、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sup>[26][27][28]</sup>。虽然其共同的缺陷是没有把文化生态看做动态系统而是静态研究，但启发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省。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族调查高潮，文化生态研究一度活跃。林耀华等撰写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为其时的典型之作。近十年来，在文化生态理论指导下，相关的实践研究迅即增多，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sup>[29][30][31][32]</sup>。的确，“全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可看做是各种文化不断地适应其境遇的变迁历程”<sup>[33]</sup>，因此，文化生态学研究意义日益显现。

### 3. 源于生物生态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如果说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带有更多文化史或文化进化的特征，那么作为文化生态学重要理论与方法来源的生物生态学是从其另一横断学科——景观生态学中展开对其研究的。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是1939年德国学者特罗尔(C. Troll)提出的，并在中欧得到传播<sup>[34]</sup>。经过40年的徘徊，于20世纪80年代得到振兴。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景观空间结构、互相作用、协调功能以及动态变化<sup>[35]</sup>。也有人认为它是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sup>[36][37]</sup>。其理论的重要概念模型包括景观基质、斑块、空间镶嵌体、廊道等。

由于文化景观具有广义景观的含义,或者说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且现代社会环境中景观的文化蕴义越来越鲜明,因此景观生态学在最近十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sup>[38][39][40][41]</sup>。伴随国际景观生态协会(IALE)于1989年成立文化与景观分会,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日渐增多。人们认识到,在人类文化发展进化过程中,“人类技艺”已成为巨大的地质力量,它通过建设与破坏作用于景观;文化对景观有深刻的影响,不仅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经济价值,而且反映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文化景观的精神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既是一种资产也可能是一种负债。当文化内容的共有准则与自然规律相符时,符合生态持续发展要求时便是资产,否则就是负债。人们通过加入“文化特征”影响与改变生态系统,但是,文化与景观的关系是互相的。文化不仅改变景观,而且通过景观来反映;文化与景观在一个反馈中互相影响文化建造各种景观,同时景观影响着文化。文化特征总是与一定的景观相联系<sup>[42]</sup>。在景观生态学领域,以色列的纳沃(Z. Naveh)、德国的葛尔斯曼(W. D. Grossmann)是较早重视文化与景观关系的学者。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有关研究人员关心景观的心理效应与生理效应,研究了景观美学以及景观的感知。美国纳索尔(J. I. Nassauer)提出了景观生态研究学中文化研究方面的四条主要原则,即人的景观感知、认识和准则影响景观,并受景观的影响;文化习俗强烈地影响着居住景观和自然景观;自然界的文化概念不同于科学的生态功能概念;景观外貌反映文化准则<sup>[43]</sup>。我国学者南忠仁基于人类生态系统的热力学分析,导出人类生态系统之熵变公式为: $dS = dS_i + dS_e + dS_h$ 。S为系统的熵,dS、 $dS_i$ 、 $dS_e$ 和 $dS_h$ 分别表示系统的总熵变、内部熵变、与外交换的熵变和由于人类的技术行为所影响系统内部的熵变。进一步考查 $dS_h$ ,则有 $dS_h = f(dS_i, dS_e, t)$ ,t代表时间<sup>[44]</sup>。这定量地表达了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sup>[45]</sup>,也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观点。我国学者对民族文化景观研究的实践表明,不同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人口质量、结构和生产技能呈现较大差别。结果相应地和社会经济系统,如产业结构、投入产出、社会组织与传统观念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但都通过长期的环境感应,建立了自己利用、改造生态环境并使之与人类社会本身协调发展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化生态系统<sup>[46][47][48][49][50]</sup>。

由于景观生态学不仅仅借鉴生态学的理论,还充分吸收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定量分析景观空间组成、空间构型、空间相关,这对建设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此外,从根本上说,两者研究的对象和构建新型的景观生态系统的目标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关概念可以对应理

解。例如，基质相当于区域主体文化景观；廊道不过是特型景观；空间镶嵌体等同于文化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等。但是景观生态学毕竟长期偏重景观的自然性研究，加之对景观历史过程的关注不足使其原生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文化生态学。它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后来提出的一些文化与景观关系原则，且已有景观生态学者意识到，文化的景观生态学方法应该置于景观生态学的中心地位并呼吁景观生态学的整合<sup>[51]</sup>。

#### 4. 源于社会学与哲学的文化生态理论

几乎与文化人类学同时，19世纪社会学界也特别垂青文化生态研究。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渗透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意识增强，使社会学家深入认识到社会文化现象与自然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基础。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学后起之秀的文化社会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文化社会学家与文化哲学学者一致认为，从宇宙整体性看，人类的社会文化创造仍是宇宙中的一种自然力；从自然界的普遍存在与联系上说，人类既是创造活动的主体，又是对象世界的客体；人类活动受外部环境制约，是不能选择生存环境的。人类只是一定环境总生命网中的一部分，并与物种群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超有机体的文化因素的引进，使其上又建立了文化层。这两个层次之间交互影响，形成生态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既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社会文化的创造。由此形成以人类为核心，人类的文化创造为层次，外围是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司马云杰运用不同类型的历史文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以及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实例说明了文化生态系统客观存在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现象分析的实际意义<sup>[52]</sup>。有关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失衡并非相关民族文化正常运作结果，而是族际关系失衡或相关文化转型而诱发的灾变<sup>[53]</sup>。应该说，无论是社会学界还是文化学界，在如何从文化理论与文化建设的实践结合的层面探讨文化生态问题，依然是薄弱环节。比较之下，梁渭雄、叶金宝<sup>[54]</sup>、袁国友<sup>[55]</sup>、王海生<sup>[56]</sup>等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人，历来是哲学关注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哲学的重要命题。文化哲学认为，文化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界不断实现双向适应、不断完成本质统一的过程<sup>[57]</sup>。由于文化的现象与文化的本质是同一的，从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中就可能找到认识文化本质的途径<sup>[58]</sup>。人类是以实践途径、文化的方式而使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同时自然通过对文化的选择实现对人类的制约<sup>[59]</sup>。哲学上的人类环境，既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总体上的文化观念。无论从自然的角度的还是从社会的意义上看，文化与环境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偶然聚集的，更不是静止不动的。其各个因素在总体的综合变化中，既显因变量的性质，